

谢国桢 著

# 明清之际 党社运动考



辽宁教育出版社

#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谢国桢 著

新世纪万有文库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谢国桢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3

(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4813-7

I. 明… II. 谢… III. 明代历史事件-研究 IV. K248.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1961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 发 行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杨 力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陶雪华

责 任 校 对 王 玲

出 版 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所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875

字 数 177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9.50 元

##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生也逢辰，问世之时，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大步，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因此初印销数不俗，令人高兴。但也可说生不逢辰：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走进书市，“爆”、“炒”之声不停，大违筹议这一《文库》时的行销氛围。在这情况下，像《新世纪万有文库》这类图书，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迎迓读者，颇劳心神。在这时刻，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以为书业箴诫。我们读之大喜，铭诵再三，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

既然“传诸久远”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编纂、排校等等运作上更费心力。第一辑出书后，反应大抵可以，但是批评意见仍然不少。当年《万有文库》定价低廉，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来了；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讎未精，为时人诟病，我们力求避免，但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至于选题，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点、高手操作，但就总体看，有些不免失诸凌乱（尤以外国文化书系为甚）。凡此种种，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并在调整、改进之中。选题体系严谨，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但就译作而言，因为版权关系，不免为难。就第二辑看，此病仍难消除。不过，当今的丛书，似乎追求系统、完整过多，有时不免因此影响质量。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

《文化生活译丛》的办法，以质为尚，体例为次。自然不可“拉在篮里就是菜”，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品，略加搭配，不论次第，纳入“篮”中，而不计较是否可以由此烧出一台完整的“满汉全席”。此种意义上的“菜篮子工程”，读者其许我乎？！

《新世纪万有文库》之能问世，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专家学者的指点。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大名，弃诸每册卷首，作为永久纪念。本辑开始，不再印出各位大名，而只是藏诸内心。把书编好、出好，为读者服务得更好，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

一九九八年二月

# 本书说明

谢国桢(1901—1982),著名的历史学家。河南安阳人,字刚主,别署瓜蒂庵等。1926年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充任梁启超助手,协编《中国图书大辞典》。1932年起任教于中央大学、河南大学、云南大学等校,1949年任南开大学教授,1957年调至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被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

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就学期间,谢国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孟森、李济、赵元任等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受饮冰室影响尤深,因对明清史、版本目录学最感兴趣,一生钻研和学术成就也大都在这两方面。

从1925年发表《明季奴变考》,谢国桢一生著述丰富,主要著作有《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末清初的学风》、《南明史略》、《明清笔记谈丛》、《顾亭林学谱》、《黄梨洲学谱》等。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认为,明末东林党争,复社、几社等集会结社的活动,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关系至为密切。作者从明清之间大量的正史、野史笔记中披沙拣金,取精用宏,勾结出从明万历至清康熙间士大夫党争与历史发展的相互关系的脉落。鲁迅先生曾高度评价这部著作,认为“钩索文籍,用力甚勤”。

本书是根据作者1982年的修订本重新排印,除个别明显的排印错字外,仍保持原貌,以存其真。

1996年12月

# 自序

当我草《晚明史籍考》的时候，凡关于明季党争和社盟的材料，随手札记下来，想作一篇明、清之际党社运动的文字。及至《晚明史籍考》草成以后，承袁守和先生厚意，在北平图书馆为我印行。但关于此项史迹，虽然积稿成堆，仍没有把它整理。

“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从日本归来，仍服务北平图书馆，在编纂室中我把旧稿从事整理。同时朱桂辛先生又约我到营造学社编《营造书目》。那时我唯一的兴趣，就是写这篇文字。其间虽然荒废了馆务，疏忽了学社的属托，但是费了三个月的功夫，终把这篇文章写完成了。

我写这篇文字的宗旨：因我昔年读全谢山《鲇埼亭集》，我感到明季掌故的有趣。我觉得明亡虽由于党争，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其间又可以看到明季社会的状况，和士大夫的风气，是在研究吾国社会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写这篇文字，就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起民族之精神。我觉得要得到一般读者的同情，还是以语体文写，较为便利一些。因此事实则引据原书，叙述则文由己出，但为读者不感枯燥起见，有时文章也不免稍为煊赫一点。

二十二年秋，来中央大学讲授明、清史，就把它拿来作讲义，并且从新修改一下，我感觉所谓“煊赫”的地方，总归于不忠实，遂把它删去了，仍钞录原文以存真相。又把重复的地方，重改过，遂成了这篇稿子的样子。并把以前作的《明季奴变考》、《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附在后面，都为一集。

已经隔过二三年的文字，再来校读，时过境迁，思想见解已与昔日

不同。结果：总觉着不满意，而且现在我治明、清史的兴味，已经没有以前浓厚了。我想由清初以上推到辽、金、渤海的历史，来作东北史整个的研究；又想读点史学基本书籍，以药不学之苦。这几篇文章，在我的治学史上如白云苍狗已成过去，存此一集，聊规我治学的过程罢了。

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五日记于  
国立中央大学教职员第一寄宿舍。



# 【目录】

## 本书说明

### 自序

- 一 引论 / 1
- 二 万历时代之朝政及各党之纷争 / 11
- 三 东林党议及天启间之党祸 / 33
- 四 崇祯朝之党争 / 51
- 五 南明三朝之党争 / 69
- 六 清初顺治康熙间之党争 / 82
- 七 复社始末上 / 101
- 八 复社始末下 / 118
- 九 几社始末 / 128
- 十 大江南北诸社 / 140
- 十一 浙中诸社附闽中诸社 / 148
- 十二 粤中诸社 / 164
- 十三 余论 / 171
- 附录一 明季奴变考 / 176
- 附录二 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 / 199
- 附录三 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补考 / 227
- 附录四 记清初通海案 / 234

# 一 引论

在明代末年，政治和社会里有一种现象：一般士大夫阶级活跃的运动，就是党；一般读书青年人活跃的运动，就是社。“党”和“社”，名词虽然不同，但都是人民自觉的现象。如今我把党、社的意义和它简单的趋势分开来说：

## （一）党

吾国古代，像汉代的党锢，唐代的清流，宋代的元祐党人，本来就有党争的事情了，但为什么到了明末又会有党争的事件发生呢？吾国最不幸的事，就是凡有党争的事件，都是在每个朝代的末年，秉公正的人起来抗议，群小又起来挟私相争，其结果是两败俱伤，所以人民提起来都头痛。但我以为党争的发生，至少，是一种人民自觉的现象，同时与国家政治的制度也很有关系。所以在一个不良的政治之下，而有党争的事件发生，也可以说是人民自觉的进步。但要是诸党相轧，也有极大的危险。杨公达撰《政党概论》引季特尔(Getty)的话：

“政党是一部分有组织的公民成立的政治单位，根据其选举权的使用，去参加政治，监督政府，以实现其主张。”

吾国的党争，虽未必与欧洲的政党相同，但我以为党争的发生，至少须有两个条件：一是人民必须有发挥言论自由权，

一是政府必须有发挥言论的机关，合这两个条件，然后才有党争的发生。

在专制时代，人民没有发言的机会，哪会有党争的事情？但是在吾国唯一专制的政局，像秦皇、汉武这样的很少。就是在秦皇、汉武时代也有御史制度之设。《晋书·百官志》：“御史中丞本秦官也。”杜佑《通典》：“初秦以御史监理诸郡，谓之监察史。”因为在古代御史大夫制度是监察政府的机关，其来已久，并且汉代太学的生徒也有发言的权利，当时所谓“清议和舆论”。所以在政治清良的时代看不出来有党争的事，但是到政局崩坏的时候，政府里既然设了弹劾政府的机关，那么一般秉公正的人，都要去弹劾政府，而一般读书的人，也要借机会来谭论国是了。

到了明代，内阁的权较低，而御史的权更高了。并且读书的人，也有发言的机会，这不能不算政治的进步。所以我们要研究明代党争之所以发生，不能不先明了明代的官制。

明代虽沿着汉、唐的旧制，但监察机关的权特别的高。明代的官制是：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到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殿阁大学士的黜陟由于阁臣的会推。到了宣宗时候，政柄无论大小，悉交大学士杨士奇等办理，内阁的权日重。到了严嵩等当朝，权更高了，和真宰相差不多，六卿皆归内阁节制。这是明代的行政机关。同时监察的机关是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御史之职，直隶于都察院，有都御史、副都御史、佾都御史的设置。《明史·职官志》云：

“洪武十六年，升都察院为正三品；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佾都御史各二人，正五品；经历一人，正七品；知事一人，正八品。十七年升都御史正二品，副都御史正三品，佾都御史正四品，十二道监察御史正七品。建文元年，改设都御史一人，革佾

都御史。……宣德十年，始定为十三道。……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十人。……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有提督，有巡抚，……及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员。”

御史的职权，《明史·职官志》云：

“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覲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黜大狱，重囚会鞠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讞平之。其奉劾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

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勉励学校，表扬善类，翦除豪蠹，以正风俗，振纲纪。凡朝会纠仪，祭祀监礼，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有大政集阙廷预议焉。”

给事中的官职，及其职权，《明史·职官志》三云：

“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给事中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并从七品。六科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钞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

御史是监督内阁的机关，六科给事中是稽察六部的机关，并且有封还章奏的权力。至铨叙的机关是吏部，吏部黜陟的责任，惟一是考察。《明史·职官志》一云：

“凡内外官，给由，三年初考，六年再考，并引请；九年通考，奏请；综其称职，平常不称职而陟黜之，陟无过二等，降无过三等，其甚者黜之罪之。京官六年一察，察以己亥年；五品下考察，其不职者降罚有差；四品上自陈去留，取旨。外官三年一朝，朝以辰、戌、丑、未年，前期移抚按官，各综其属三年内功过状，注考汇送覆核，以定黜陟。”

同时内监为君主的近侍，是传达命令，出纳章奏的机关，它的权柄也很大。《明史·职官志序》上说：

“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指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

由上诸端，我们可以明白明代的官制。（一）行政机关，内阁仅备顾问，责任六部，共任天下的事。（二）监察机关，御史大夫是监督政府的机关，六科给事中是监察六部的机关。（三）铨叙的机关，大臣是会推，小臣是考察，吏部的考察，是进退官吏的惟一机会。观以上的制度，似乎是很完备了，但到明代中叶，却发生了变化。内阁的权高了，六部不能不听命于内阁，铨叙的使命，也就不能公平。御史大夫监察的机关，不能不出来弹劾政府，政府自然而然的与言官相水火了。言官是代表一般的舆论，人民多同情于言官，所以言官的清望日高。内阁的势力稍一低落，则不能不勾结言官，御史大夫们哪能个个人品靠得住，所以就自己分了党派。自张居正以后，一班庸愚的宰相，像沈一贯、王锡爵之流，他们只知道巩固地位，传衣钵，哪知道国家的大计。东寇日逼，朝事日纷，那一般内监们，趁着机会起来，攫夺了政府的实权，宰相们反得听命于内监。御史大夫和六科给事中，与内监成了对敌的现象，那时候，党祸之势就成了。

凡万历时代之朝政，我们所知道的所谓：国本论，三王并封，建储议，福王之国，楚太子狱，科场案，辛亥京察，丁巳京察，《忧危竝议》，妖书，熊廷弼案等事，一直到挺击、红丸、移宫等三大案，这都是他们的争端，凡当时纷争的人，像东林、齐、昆、浙、宣等党，是他们的党派，他们讨论的焦点，拿现在的眼光来看，似乎过去；但他们倔强不挠的精神，是可佩服的。

到了天启年间，魏阉当政，昆、浙、宣三党投降了内监，把以前最纷乱的案件都归纳到三大案里面，造成了《三朝要典》、《东林党人榜》等书，可算是把东林的势力压下去。但崇祯初立，消

毁《三朝要典》，更立逆案，东林的势力又膨胀起来。但我们看崇祯一代，钱谦益、周延儒的相争，周延儒、温体仁的相倾，袁崇焕的被戮，郑鄮的获罪，姜采、熊开元廷杖，他们的背景，都脱不了两党的暗斗，而把东酋的侵略，仿佛形若无事的一样。一直到了北都不守，清兵南下，福王弘光帝即位南京，半壁的天下，应该和衷共济了。但福王之立，马士英、阮大铖重修《要典》，伪太子，伪皇妃之狱都脱不了党争的纠纷。可怜隆武伏处福建，鲁王监国海岛，他们还要辨白叔侄的名分，桂王仅有云、贵两省，他们臣子还分了吴党、楚党，直至呪水之役，同归于尽，才算完事，这真是又可悯，又可笑了。

平心而论，魏党的跋扈，祸人误国，固不足道；但东林太存意气，在形如累卵的时局，他们还要闹家务，还存门户之见，置国是于不问，这也太不像话了。但是一般无耻的士大夫，明代覆亡之后，既入仕新朝，就好好作官罢了，他们在一个雄猜之主，康熙帝的掌中，偏偏的要斗一点心智，自相倾轧，假道学的名义，来行其奸诈，士大夫的气节就此扫地，真可谓党争的末路了。这一套的假面具，我们不能不为它揭破。

由上我们看来，在万历年间，东林和三党之争，他们所争的有宗旨，有目标。到了魏阉专权以后，他们好像闹家务，目标和宗旨都完全失去。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万历间是东林与三党相争的时期，天启间是魏党专横的时期，崇祯至永历是两党相轧的时期，康熙初年是党争的末路。

## (二) 社

社这个名词，来源很久，《说文》“社”字下云：“地主也，从示

土。《周礼》二十五家为社。”人民在所住的地方，祭他们所居住地方的神祇，封土以为记号，那就是社，《周礼》所谓社是祭神的地点，春秋是祭社的时间，因此有春社秋社之称。《周礼》所谓州社，《左传》所谓书社千社，汉代有乡社里社的名称，由社为一地之主，因其地而引申为社会的组织。后来习武备的叫作社，文士的结合也名作社，像晋代的惠还莲社，宋代胡瑗的经社，元代的月泉吟社，这都可以说明代结社的起源了。俞正燮《癸巳存稿》云：

“《日知录》谓社是盗贼之称，明学士称同社不知其意，其论甚快，今按社歇后语也。祭社会饮谓之社会，同社者，同会也，古有莲社。《直斋书录解題》有孙觉《春秋经社要义》六卷。《宋史·孙觉传》云：‘胡瑗弟子千数，别其老成者为经社。’吴自牧《梦粱录》云：‘文士有西湖诗社，武士有射弓踢弩社。’又有诸集社名目，元有白莲社、月泉诗社，明复社多八股语录，几社多奇士伟人。我朝顺治九年，礼部颁天下学校卧碑第八条云：‘禁立盟结社’。十七年，又以给事中杨雍建言禁妄立社名，及投刺称同社同盟，则以八股牟利，假借社名也。十六年例则士习不端，结社订盟者黜革。康熙二十五年，查革社学。雍正三年，定例拿究。皆非社而冒称社，俗之蔽，士通文曰词坛，曰吟坛，亦社坛也。……”

由于明嘉靖以大江南北以及山、陕个别地区社会经济极为繁荣，水陆交通也很便利，所以文人的社集，到了明季最繁盛了，但是为什么到了清代，有这样的严厉禁止，这很有研究的价值。我们知道明代以八股取士，作八股的，须要识得风气，知道一时的风尚，文章才不至落选。比仿《儒林外史》上，马二先生说“本朝洪、永是一变，成、弘又是一变”。文章要变的时候，这非揣摩它的风气不可。所以一般书店，就借此机会，选出几篇文章来牟利，而这般书店的老板非借重一般选家，或者可以说是操选政的名手不可，所以马二先生之流，就可以在西湖上大出风头了。

因此一般士子们集合起来习举业，来作团体的运动就是社，他们或十日一会，或月一寻盟。杜登春《社事始末》云：“几社六子，自三六九会艺，诗酒倡酬之外，一切境外交游，澹若忘者。”并且社事的集会，有读载书歃血等事，所以又名作社盟。而他们集合同社的文章，选出来，就是社稿。只要社稿能得一时人的景仰，那末他的社一定可以得到势力了。

在万历、天启年间，江西艾南英、陈际泰、章世纯这一般人，他们号召拿成、弘派的文章，来改革当时的风气。当时一呼百应，很披靡一时，艾千子常从南昌跑到江、浙的苏、杭的地方去选文，他的势力，就此可以概见。

那时候太仓的张溥，他利用这个机会，就将张采等所成立的应社，与孙淳、吴翻所办的复社合并，第一步就提倡铨经铸史的方法，来改革主张成、弘派的文章，不久他的社员皆中了高科，这是他的计划成功了。第二步他就利用以群众作后盾去干涉政治，明崇祯间的宰相可以由民意去更换，这时候一般读书人的势力有这样的伟大。所以我们看吴应箕的《复社姓氏录》上；他联合全国的士子不下二三千人；他综合北至山东南至湖广的小团体，不下有数十个，这样的状况，在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就是东汉的党锢，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结社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普遍了江、浙、福建、广东、江西、山东、河北各省，风行了百数十年，大江南北，结社的风气，犹如春潮怒上，应运勃兴。那时候不但读书人们要立社，就是士女们也要结起诗酒文社，提倡风雅，从事吟咏（见《照世杯》小说），而那些考六等的秀才，也要夤缘加入社盟了（见二刻《增补警世通言》小说）。

社盟的成立，既然这样的繁盛，他们结社会朋，动辄千人，白下、吴中、松陵、淮扬，都是他们集会之所，秦淮河畔，桨声灯影，虎丘池边，塔影夕阳，桃叶问渡，小院留人，这种景况，我们



读了王士禛的《秣陵新诗》“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的诗，仿佛还见其迹。张天如的《国表序》说：“社集之开，胥闻之间，维舟六七里，平广可渡，一城出现，无不知有复社者。”陈去病的《五石脂》说的更好：

“据父老传说，第就松陵下邑论，则垂虹桥畔，歌台舞榭相望焉，郡城则山塘尤极其盛。画船灯舫，必于虎丘是萃，而松陵士大夫家，咸置一舟，每值集会，辄鼓棹赴之，瞬息百里，不以风波为苦也。闻复社大集时，四方士子之擎舟相赴者，动以千计，山塘上下，途为之塞。迨经散会，社中眉目，往往招邀俊侣，经过赵李，或泛扁舟，张乐骊饮。则野芳滨外，斟酌桥边，酒罇花气，月色波光，相为掩映，倚阑骋望，俨然驱龙出水晶宫中，吞吐照乘之珠。而飞琼玉乔，吹瑶笙，击云璈，凭虚凌云以下集也。”

在这流连诗酒，谈笑歌舞的当中，猛然霹雳一声自天而降，想不到的清兵，自北而来，无情的铁蹄，踏破了金陵，扫荡了河山。这一群士子，由诗酒结社之逸情，一变而为杀敌灭仇的伟举，死的死，亡的亡，有志的青年，大半都为国牺牲了性命，颓废的老者，也入山当了和尚。那时候清兵满洲贵族与汉族的军阀官僚勾结起来，由江苏一直杀到广东，我们的汉族人民至死不屈，就是留下一二残黎，像王翊、李长祥等人，他们还在浙江的大兰山，安徽的英山、霍山，依岩结寨，闹了五六十年。我们知道他们唯一对敌的方法就是抵抗，他们自卫的方法就是不屈。像这般有为的青年，大半是社局中人。到了时过境迁，澄江一碧，惟余呜咽之水和两三点寒鸦的晚噪，渔夫樵子们还在那里唱着山歌。静寂的山光，无情的烟水，这些壮士的英灵，又上哪里去了。我们读了孔尚任的《哀江南曲》，真有不胜今昔之感了。因此在社集的活动方面，我们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 (1) 嘉靖到万历初年的社集以文会友，是社集萌芽的时代。
- (2) 崇祯年间社局，由诗文的结合而变为政治的运动。
- (3) 弘光以后，由政治的运动而变为社会革命的运动。